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and
the Role of China

朝核问题与 中国角色

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

王俊生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

——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

王俊生 著

 世界事务出版社

序 言

赵全胜（美利坚大学）

王俊生博士的这本专著即将出版，可喜可贺。俊生在2007到2008学年度从人民大学来到我所在的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从事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就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可以说，我也目睹了这本书写作与完成的过程。回国以后俊生很快完成了论文答辩，并到中国社科院工作。现在论文又要出书。对于这一系列成果，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他认真梳理了朝核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把事件的发展放到东亚国际关系以至世界政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他不但把朝核问题的背景、发展过程和解决方法交代得很清楚，而且还就中国对朝核问题政策的内外考虑作了详细地解剖。因此，对任何一个想了解朝核问题的学者、官员以至一般大众，这都是一本十分有用的参考材料。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翻开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朝鲜半岛是中、日、俄、美四大强国战略利益交汇的地方。无论是清王朝的衰落、俄罗斯的扩张，日本的西化与崛起，还是美国在当代世界政治中领导地位的奠定，无不与朝鲜半岛上的争端息息相关。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拥有几千万人的半岛的命运就注定要与大国政治纠缠在一起。而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半岛的关切虽然时大时小，时远时近，也是宿命般地被拴在这一方土地上。如此，朝鲜半岛就成为亚太国际关系中“高手如云，动静有戏”的剧场，上演一幕幕的活剧来。所以我们研究朝核问题离不开大国政治，而研究亚太国际关系也离不开朝鲜半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

第二个特点，是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国际关系中的理论框架来说

明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位置和所采用的外交策略。书中所运用的“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的理论框架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尝试。如作者所说，这一理论框架是在我所提出的“大国关系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我在2006年《亚洲视角》(*Asian Perspective*)发表的论文中^①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中“大国关系管理”这一概念。后来于2007年，我在《战略研究》(*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上发表的论文中^②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模式。这两篇文章都被收入到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国政治与外交：美国、日本、中国与大国关系管理》^③这本书中。

正如我在论文中指出，大国关系管理模式(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MGPR)作为一种概念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和模式。在理论层面，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共同管理朝核问题，需要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有自愿合作的国家存在。罗伯特·基欧汉和亨利·基辛格都强调这些国家必须存在利益的交集，多方通过共同努力都能从中受益。^④第二，为了维持国家间合作正常进行，应创造充足的动力以克服国家利益中的分歧。肯尼思·沃尔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都曾强调，国家间利益重叠虽然有助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但若缺乏强烈的动力去维持，那么这些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和竞争因素很可能最终致使其合作中断^⑤。第三，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奈所论述的那样，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和制度作为一个载体，从而在大国间进行日常的共同管理^⑥。我们还应

① Quansheng Zhao, "Moving Toward a Co-management Approach: China'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and Taiwan," *Asian Perspective*, vol.30, no.1, April 2006, pp. 39-78.

② 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Do We See 'One Up and One Dow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4-5, August-October 2007, pp. 609-637.

③ 赵全胜：《大国政治与外交：美国、日本、中国与大国关系管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④ See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 138, and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ouchstone, 2001), p. 152-53.

⑤ See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106, and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373.

⑥ See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44, and Stephen Krasner,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2.

该强调指出，对于大国管理（MGPR）的架构，有以下六个基本层面组成，其中每个层面均对理解大国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基本的共识为增强国家间互信提供基础。

大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基础与彼此拥有的对对方的认知有关。众所周知，对大国关系的分析可以分为诸多流派。冷战时期，主流流派是所谓的“零和游戏”。美苏两国都视对方为竞争对手并需要“击败”。基于这种认识，诸如围堵和世界革命等战略手段被华盛顿和莫斯科广泛推崇。它最终也成了国际关系中自我实现诺言的缩影，即：制造一个敌人最好的方法是你把其作为敌人来对待。在后冷战时期，随着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趋势加强，许多政策制定者从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转向“双赢思维”。换句话说，如果大国间进行合作，那么其中一个国家的发展并不必然以另一国家的损失为代价^①。当代国际关系的主流思想不赞同过去的流行看法——霸权国和崛起国间冲突不可避免，他们转而强调为了和平与稳定，国际危机时最优先的考虑应是国家间相互合作对危机进行管理。如果彼此国家的领导都能认可这个观点，那么互信的基础就能建立并加强。在共享观念的影响下，共同管理的情形也就可以出现。在这一点上，北京和华盛顿都已经在努力避免这种视彼此为“对手”的恶性循环。尽管偶尔还可以在两国听到鹰派的一些强硬观点，但是主流的看法是太平洋两边的美国和中国是伙伴，而非对手或敌人^②。

第二，充分的动力让大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合作。

大国之间在建立积极和良好的互动关系上拥有共同利益。他们可以通过建立这种关系为其政策的优先目标服务，保持地区稳定——最重要的是——阻止战争。正如我们从中美关系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每一方来说，合作的动力在于避免与对方爆发全面的军事冲突。这种军事冲突的后果无疑将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正如我以前曾经指出的那样，中美两国间任何军事冲突都将导致政治的、经济

① See David Lampton, "China's Rise in Asia Need Not Be at America's Expense,"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06-326.

② For an insightful analysi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e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的和物质的灾难^①。其中，最有可能点燃两国冲突的地区是在台湾和朝鲜半岛，也正是在这两个热点地区，北京和华盛顿合作非常紧密。另外，大国之间在诸如联合反恐，国际贸易和全球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拥有合作的广泛动力。

第三，处理国内政治的建设性的方法。

历史教训表明，如果一国国内政治被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所驱使，那么该国与邻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关系很容易走向冲突。我们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找到类似佐证，特别是德国与日本的经历更是如此^②。在当代，管理国内政治比较正面的例子体现在地区层面上——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体化，也即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而比较负面的例子是日本在发展与其邻国关系上，特别是与中国和韩国关系上，一直裹足不前。在这些国家——日本、中国和韩国，历史因素以及民族主义的抬头是过去几十年东亚共同体始终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为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民众中健康性的讨论和对年青一代富有建设性的教育十分必要。同时，国家领导人需要避免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承担责任地诉诸民族主义的行为。

第四，制度化和有效机制。

要实现大国关系的管理，就需要一些可行的机制。这些机制能够保证大国之间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交流、磋商、劝说和谈判。他们可以是双边的直接对话，比如在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之间举行的高峰年度会议，和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的每年一次的战略对话。由于历史原因，在亚太地区缺乏类似于北约组织的安全合作组织。因此，中国针对朝核危机开展的六方会谈得到各方普遍赞誉，人们对这种机制给予很高的期待。中美两个大国都致力于解决这一潜在危机，他们同时还在联合国的决议中达成共识。这种形式的论坛，事实上不仅为公开政策讨论提供了场所，而且彼此也可暗地里讨价还价。尽管六方会谈的有效性还有待于检验，然而它事实上却是该地区

^① See Quansheng Zhao,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and Sino-U.S. Relation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1 (Dec. 2005), pp. 1-27.

^② See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especially chapter 6. For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case, see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and the World since 1868* (New York: Edward Arnold, 1995).

中国和美国均扮演领导角色的以安全为讨论主题的多边组织。按照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观点,进一步发展后的六方会谈或者类似的组织在该地区变得很急需,这样的组织不仅可以解决一些类似于朝核危机的国际危机,而且也为各方扮演适当角色提供了平台^①。同时,霸权国和崛起的大国也能在此表明各自的利益。另外一种制度安排是针对敏感问题而达成的默契,比如北京和华盛顿在反对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上所实行的心照不宣的共管。过去几年,在强调台湾海峡维持现状的重要性上两国紧密合作,特别是反对台湾民进党领导人试图寻求独立以改变现状的努力。通过这种合作,台湾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行为者的行为得到管理,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大国间的正常关系。

第五, 危机预防措施。

日常的机制安排在和平时期可能有效,但是在危机情况下或许还不够。危机预防机制应能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可以有效阻止大国之间的外交陷入灾难,比如2001年4月美国的EP-3侦察机事件。北京和华盛顿显然需要进一步发展这种机制,以便确保两国最高层沟通能在危机情况下畅通无阻。这种日常的机制安排还可以推动两国在功能性层面的沟通,比如,在北京的外交部和华盛顿的国务院,或者人民解放军和五角大楼之间。当然,这种开放的沟通渠道仍可以被广泛的人员交流进一步扩展。总之,大国和相关国家之间应鼓励在官员层面、智囊层面、知识分子层面以及其他渠道开展更广泛的接触。此外,危机管理也要求彼此在意图上有一定的透明度。例如,华盛顿和北京都应建立一些规则以便在对方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或外交动作时,能明白对方的意图,从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第六, 多层面的接触以维持和扩大共同利益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管理大国关系,大国和相关国家之间需要通过多层面接触以维持和扩大它们共同利益的基础。这将要求不仅官员之间需要举行会议,而且也要求公众之间进行交流。事实上,公众外交非常必要。扩大后的共同利益基础应该超越纯粹军事和战略议题。应进一步加强经济和贸易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中日和中俄之间的经

^① See Christopher Hill, "Update on the Six-Party Talks," address to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Feb. 22, 2007), transcript and video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comm/events/20070222hill.htm>.

贸关系将会更加相互依赖。在其他领域——比如教育、科技——的对话和交流也应该鼓励和扩大。有许多途径可以加强彼此理解，教育人员的交流就是很好方法。全球化趋势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而且也包括大国之间对彼此国内的发展会越来越关心。当然，不干涉内政原则仍需要被遵守。无论如何，当大国之间在社会层次上拥有更紧密的联系时，尽管彼此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他们会自然地分享其价值和文化。

以上六个方面阐明了管理大国关系的涵义。管理的基本目标在于阻止大的灾难发生，比如核武器大国间爆发武装冲突，最终目的在于加强彼此的互相理解和社会层面上的融合。正像我们从最近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华盛顿和北京都存在一些如何处理与对方关系的政策争论。前苏联时期的“零和游戏”仍不时占上风，但是在两国首都主流的认识是通过管理的途径来发展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可以从华盛顿的奥巴马政府和北京的胡锦涛政府均将其作为主流战略考虑中得以证实。

很高兴地是，在大国关系管理这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王俊生博士又作了带有进一步深化的发挥。例如，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他提出了以下几个更加具体的划分。首先，在管理态势上，有“危机共同管理”和“常态共同管理”两种。在参与主体方面，可以分为“关键方”、“重要方”和“一般方”。在发展过程方面，可以分为“起始阶段”、“发展阶段”、“结束阶段”和“评估阶段”。在角色变换方面，还可以分为“被动方”、“主动方”、“管理者”、“被管理者”，等等。我的一位在东京大学任教的同事也提出应该对“共同管理”与“政策协调”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作出明确的区分^①，这些提法和建议都使共同管理这一模式更加深入和广泛，也更能展现出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生命力。

我还想指出的是，这本书也是国内学者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里做出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它有意识地体现了在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开展扎实的案例研究的原则。众所周知，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近些年出现了蓬勃的发展态势，现在又涌现出像王俊生这样的精锐的青年研究人员。应该强调的是，我们不光要从事具体政策的研究，例如朝核问题，同时还要就国际问题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解

① 与东京大学 Gregory Noble 教授的电子邮件通信，2010年3月3日。

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力提倡青年学者出版有分量的专著的原因。毋庸置疑，出版带有前瞻性思想和理论的论文绝非易事，但出版有分量的专著则更为不易；它需要作者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系统的研究，既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要把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分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式。在这里绝对没有贬低期刊论文的意思，而只是说，具有扎实功底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比期刊论文更能代表一个学者的水平，也更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这一点是政治学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研究的一个特点，在美国的学术界里已经蔚然成风。其他领域（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则可能与此不同。所以，我希望看到国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写出更多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再有就是国际化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的学者都常常提到话语权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里很少能够被听见。在我所接触到的日本和德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中，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埋怨，说他们的相关论述只在国内传播，而得不到世界的重视。这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统治地位仍然被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英所占领。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即在英国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霸权的一二百年时间内，不但它们所产生的各个学派在学术界独领风骚，就连英语也成了学术界的通用（或半通用）语言。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还要等待权势转移的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实现之前应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化。日本和德国的学者已经在努力把自己的论文用英文发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自己的学派、思想、研究推向世界，这也是我们很多中国学者所已经采取的方法之一。所以我建议俊生博士还应该尝试着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全球。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里，正如其他领域一样，我们还可以提倡内外交流、共同培养这一模式。国家教育部和国内重点大学已经在这方面得到了政府的有力资助，从而使这样的安排也成为可行。如此内外结合，则国内的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将是指日可待的。

2012年4月30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前 言

本书属于案例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行为来研讨两个议题：中国的角色与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这两个议题在书中是平行的。但在具体研究上，本书重点关注中国角色的研究，以此作为一条主线。与此同时，将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作为一条辅线。也就是说，本书主要通过分析中国对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管理，来论证该地区新出现的对热点问题的管理模式，从而进一步探讨这种管理模式的合理性以及推广前景。同时，尽管研究第二次朝核危机的成果较多，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历史描述的多，学理性研究的少；规范性研究的多，实证性研究的少；对中国角色泛泛而谈的多，系统研究的少；赞扬的多，反思的少。而把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与中国角色以专著形式进行研讨的则未出现。本文力求在研究中国角色与朝核问题解决模式的基础上，从学理层面还原第二次朝核危机解决的全貌，特别是各国相关政策背后的动因，并重点评估中国角色，意在使上述不足研究状况得到改进，并为相关的政策研究提供参考之见。

之所以设定这两个研究议题，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从重要性的角度来看，朝鲜核问题几乎牵涉到中国所有重要的双边关系，比如中美、中俄、中日等，因此研究这一议题对中国外交研究意义重大；其二，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也普遍注意到六方会谈是中国第一个起主导作用（与美国一起）的多边对话框架。如果考虑到中国在过去对多边交互方式相当敏感，担心其成为围堵中国的场合，即使参与也只表达态度，不发表意见，更不会主动起草草案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如此主动，且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与外交资源，乃至亲自起草《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这些是否预示着中国外交定位正在发生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如果是，这种变化的国内外动因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如何解释这一

“例外”？其三，还是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相比于几乎是同期爆发的，也几乎是同样性质的伊拉克问题——都是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美国爆发矛盾，但朝核问题有惊无险，而伊拉克问题走向战争解决途径，这种结果大相径庭的原因何在？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能否推广到其他国际危机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比如伊朗核问题和达尔富尔问题等？可见，对这两个议题的很好研究，不仅对中国外交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如果能较好给予回答，就有可能在理论与经验层面做出微薄的创新。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书首先从历史上朝核问题的发展演变入手，总结了过去曾经尝试过的几种管理模式，即：大国冷战模式、战争对抗模式（边缘战争模式）、联合国框架下的解决机制、双边交互方式等。而中国的角色演变大体为：第一次朝核危机的“不介入立场”和“四方会谈”中的适度介入。然后进一步详细分析了以上这些管理模式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以及中国以往的角色设定为什么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地区与国际环境。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共同管理”。从这一定义出发，本书在第三章、第四章以及第五章分别从共同管理的机制、自愿管理的国家与动力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角色与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展开了深入分析。而第二章则是对中国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上角色的背景与动力所进行的分析。第六章与第七章则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角色与朝核问题共同管理的前景进行了分析。

在结论部分对理论层面进行升华时，本书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这一议题研究时的主要理论视角——多边主义与安全合作视角——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然后，通过对第二次朝核危机这一案例的翔实分析，加之与已有理论研究视角的对比，总结了引入共同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合理性、现实性、局限性，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近几年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一系列复杂变化，比如韩国对朝政策更为保守、朝韩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在金正日去世、金正恩上台后，人们对于六方会谈共同管理朝核问题的前景以及中国的角色提出了质疑。事实上，就事态发展的本质而言仍然符合本文的分析与判断。首先，朝核问题的根本症结仍然在于朝鲜基本安全感的缺乏。2011年美国与北约盟国对选择弃核的利比亚进行武力打击，推翻了卡扎菲政权，

更加深了朝鲜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保证安全的认识。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日趋保守，对朝强硬。两国于2010年更发生了天安舰事件与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韩关系全面敌对。国内层面上，为改善严峻的经济形势，2010年朝鲜进行了货币改革，目前正在推进设立自由贸易区、经济特区等。历史经验表明，一个传统上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越是在政策调整、向外开放的时刻就越可能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在个人层面上，金正日去世后，接班人金正恩年少登大位，在党内与军内的历练较短。所以，目前对于朝鲜领导人来说，是其心理安全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刻。

其次，近两年形势的发展再次让朝鲜坚定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判断。朝鲜更加确信在当今世界上有愿望又有能力颠覆其政权的唯一国家就是美国。日韩两国尽管对其敌视，但在东北亚议题上紧跟美国。只要能得到美国的实质性安全承诺，政权安全不会存在致命威胁。冷战后，从金日成与金正日的外交努力来看，一直在致力于对美关系正常化，起码要获得其“不侵犯”的书面保证。对于金正恩来说也是如此。

最后，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多边共同管理。目前来看，在朝核问题上，就维护现状与和平而言，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这其中，中国有两点是其他国家无法代替的。其一，中国 and 所有相关方都保持友好关系；其二，由于历史与地缘因素，中国又是唯一能实质性“直通”平壤的大国。由于力求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东北亚局势的复杂性与全局性，以及历史的惨痛记忆，中国真诚希望和平、彻底地解决朝核问题，去除这一定时炸弹。但尽管如此，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钥匙”不在中国手中，中国必须和其他几个攸关方进行共同管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中国一直在推动美朝直接对话解决实质性问题，而且从近几年美朝的互动来看，双方也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渠道，但是这会削弱六方会谈多边共同管理机制吗？答案是否定的。第一，美国不信任朝鲜。虽然解决核不扩散问题，美国需要和朝鲜面对面交谈，但是任何实质性协议的达成与落实，美国仍然依靠六方会谈多边框架下的多边共同监督。第二，朝鲜的筹码有限。通过直接对话，朝鲜当然可以直接向美国表达其核心关切，但是国际关系的本质仍然是实力决定利益的获得与维护。在与美国博弈上，朝鲜显然

需要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配合与协助。

第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的战略支柱仍然是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美国直接与朝鲜达成妥协，日韩也不会同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由于朝鲜的能力有限，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甚至战争并不会威胁到美国本土，也不会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由于历史与地缘因素，却能威胁到日韩两国。因此，对于控制局势，解决朝核问题，日韩也迫切需要参与共同管理。

王俊生

2012年8月2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	8
导论 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	1
第1章 朝核问题的爆发与共同管理视角的引入	5
第一节 朝核问题的历史演变与相关解决机制的失灵	5
第二节 历史上中国介入朝核问题的特点	19
第三节 共同管理视角的引入	27
第2章 中国角色的多元背景和动因	39
第一节 “主张超脱”还是“寻求介入”	39
第二节 “联美对朝”、“联朝对美”还是“中间人”	48
第三节 “有决定性影响”还是“有限影响”	57
第3章 六方会谈机制与共同管理	70
第一节 从三方会谈到前三轮六方会谈	70
第二节 艰难的第四轮六方会谈与《9·19共同声明》的出台 ...	89
第三节 朝核试验和《2·13共同文件》的出台	94
第4章 中国与当事国朝鲜与美国的协调与管理	107
第一节 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因	107
第二节 中国与朝鲜的协调与管理	115
第三节 中国与美国的协调与管理	130

第5章 中国与韩国、日本、俄罗斯的协调与管理	144
第一节 中国与韩国的协调与管理	144
第二节 中国与日本的协调与管理	154
第三节 中国与俄罗斯的协调与管理	165
第6章 中国走向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	174
第一节 多元背景的特点及其分析	175
第二节 中国走向共同管理	182
第三节 对中国角色的总结与反思	189
第7章 朝核问题的共同管理及其前景	201
第一节 朝核问题走向共同管理	201
第二节 朝核问题的发展走势	207
第三节 朝核问题共同管理的出路	211
结论 多元背景下共同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220
附 件 朝鲜核问题大事记	234
主要参考书目	240
后 记	244

导论 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共有七章。在第一个部分，也即本书的第一章，首先论述了朝鲜半岛历次核问题的形成及其相关解决模式和机制，比如战争对抗模式、大国冷战模式、双边机制、联合国框架下的解决机制等。在此基础上指出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特点，分析了为什么既有机制都不适用，从而引入与探索一种新的危机和热点问题管理机制——符合后冷战时期多元背景下的东亚危机和热点问题管理的客观要求；接着，本部分进入单位层次，也即主要说明中国介入历次朝核问题的方式、特点、作用，这主要为分析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中国角色做铺垫。在以上基础上，讨论了在朝核问题上引进共同管理视角的依据与意义。

第二部分，也就是书中的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中国角色制定的多元化背景和走向共同管理的基本动因。相比于第一次朝核危机，中国角色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国内背景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政策争论的多元化声音公开出现。也即本部分所讨论的三组争论：“超脱还是介入”、“联美对朝”还是“联朝对美”、“至关重要的影响”还是“有限影响”。在这里不仅讨论了学者和政府机关人员的声音，也讨论了网民等大众的声音。

紧接着进入第三个部分，也即书中第三章“六方会谈机制与共同管理”。这一部分安排有两个目的。1. 由于本书是把朝核问题和中国角色作为两个并行的线索，因此，这一章节基本上是从经验层面梳理各国围绕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而展开的协调与管理，为讨论中国角色做出铺垫；2. 正如赵全胜教授在讨论“大国共同管理”概念时所指出的三

个基本要素——“自愿合作的国家、合作的动力、合作的机制”^①，本书将这三点作为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是否走向共同管理的主要论证依据。本部分主要为探讨共同管理中的“合作机制”提供经验支持。也即主要论述六方会谈怎么由一个松散的多边对话框架逐渐走向了“相当程度”的机制化——尽管目前仍然离真正的“高度机制化”距离还很遥远。

第四个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在共同管理视角下，中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如何对朝核问题进行管理。在内容上主要讨论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共同立场”、“彼此分歧”、“共同管理的动因”、“共同管理的特点”等几个层面，为论证共同管理中的“自愿合作的国家”与“合作的动力”两个方面服务。从六方会谈的角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中国、朝鲜与美国是主要角色，韩国的因素很特别，相比而言俄罗斯和日本则属于较为次要的角色。第四章首先探讨中国与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协调与管理。第五章讨论了中国与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协调与管理。

第五部分，也即本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经验总结。在这一部分不从理论角度展开，仅仅在以上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探究中国是否走向了共同管理，以及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是否属于共同管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朝核问题共同管理的前景。

最后是本书的结论部分，这部分是逐步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本书的结论，也即多元背景下共同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必要性：在开始朝核危机解决后，国际学术界都在考虑怎样对这一解决模式概念化，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席国，中国自己当然应该当仁不让地总结朝核问题解决模式所可能提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共同管理概念的适用性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意义。中国学者在前一段的讨论中更多地用多边主义和安全合作来认识，是否妥当，共同管理与一般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什么关系，等等；3.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实践意义，也即对其他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的启示意义与适用的可能性，以及更大范围内处理大国关系（全球）的价值；4.提出评价，国际关系领域与高度组织化下的管理毕竟不同，那么引入这样一个视

^① 参见：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Do We See ‘One Up and One Dow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p. 609-637.